中特鼓吹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欺骗性的口号

西江月

中特鼓吹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欺骗性的口号

February 13, 2022

中特鼓吹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欺骗性的口号

西江月
自蚂蚁金服IPO被叫停以来，中特政府陆续出台了规范社区团购、禁止大数据杀熟、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一步强化反垄断、“双减”等一系列政策。而在2020年和2021年的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口号。

一时间，在舆论场上，作为资本的代言人曾红极一时的“马爸爸”仿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政府则成为了挥舞“社会主义铁拳”，压制资本、捍卫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不少人憧憬着“共同富裕”的梦想，欢呼着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向。然而，诸如996、外卖骑手自焚讨薪、B站员工春节加班猝死等事件却一再提醒着人们：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却依然处在资本的囚笼之中。这种看似怪异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最高指示为何不能将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呢？因为，归根到底，中特所鼓吹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只是一句充满欺骗性的口号。

第一，所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针对的仅仅是企业在市场竞争和侵犯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不法行为，而对于受资本扩张侵犯的广大普通劳动者却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当一部分私人资本无序扩张、追求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的行为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经济风险时，当私人资本无序扩张侵犯普通消费者利益而引起社会舆论时，中特政府出手予以了一定的管制。但是，对于广泛存在的资本无序扩张侵犯劳动者权益、甚至公然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中特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始终没有真正出台有力的措施，很多时候甚至利用国家机器打压工人的反抗。

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人们更加关注到算法在资本的无序扩张下是如何控制劳动者的，而《我们应聘过骑手，打过卧底电话，看了1907份判决，最后拼出了这部外卖平台进化史》则让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大量的骑手在受伤之后找不到用人单位来承担责任？为什么现有法律在根本上不能成为维护骑手权益的依靠？“原本集中于单一雇主的权利与责任被分散到多个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身上，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人为的外包和分包被彻底打碎。不但导致骑手分不清用人单位是谁而大大增加维权成本，就连法院也可能因为难以确定用人单位而判决骑手败诉。”法律本应用来保护弱者的底线权益，而在特色社会主义中，法律却成了强者明目张胆转嫁风险的精巧门道。在实际中，影响法院是否认定劳动关系并界定责任的并不是法律问题，关键因素是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有多大。“钱的问题小于命的问题。”如果骑手是因为工资、加班费、赔偿金等的问题去起诉，法院更有可能不认定骑手和公

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但如果是受了工伤甚至是死亡，这种情况下法院更有可能去找到一家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现实中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弱势的劳动者面对资本的压制寻求法律帮助无果，或是遭到政府部门推诿，在工人没有组织力量的情况下最终只能采取跳楼、自焚等伤害自身的方式来争取自身权益。而那些锲而不舍维护自身权益，或是组织工人集体维权的劳动者，往往被企业和官员认为是“刁民”，有时要付出沉重的经济或社会压力的代价。试问，不打击资本针对劳动者的无序扩张，这样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欺骗又是什么？

第二，所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仅仅针对的是私营互联网平台企业，并不针对其他私营资本，更不针对中特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地位的主要经济基础——国有企业。要说反垄断，以大型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中特政府不但不反，反而在不断维护和加强其垄断地位，美其名曰“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官僚掌握的国企真的代表人民利益吗？举几个例子，情况就不言自明了。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工仅允许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使用，但现实是，在目前所谓的“国企”中，普遍、大量存在劳务派遣、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国企大量存在的建筑行业，违反法律规定不签订劳动合同、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等各种问题也一直普遍存在。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在所谓“社会主义国企”得不到落实，公然违法现象大量存在，工人权益不断受到国有资本侵害且得不到社会关注，工人也没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渠道，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如何相信中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口号能真正落实呢？

第三，所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从根本上来说是官僚垄断资本集团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实质是官僚垄断资本防止某些“民营资本”无序扩张，破坏统治秩序，而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铁拳”。2022年1月21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中首次出现“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的提法。1月26日，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开除党籍公职，在其落马通报中我们看到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应私营企业主请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的提法。联系到周江勇之弟所控制的优城联合（蚂蚁金服是其战略投资者）能够轻松获得杭州地铁移动支付业务的主导权，我们不难想到周江勇勾连的资本中究竟有谁，也不难想到在蚂蚁金服发展壮大的背后周江勇作为杭州市委书记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这一事件恰恰说明，私人资本对中特政治统治的侵蚀和威胁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不得不去处理。在经济层面，资本无序扩张会带来企业杠杆率过高、放大交叉性金融风险、利用监管缺失套利等诸多问题，而类似疯狂烧钱推进社区团购这样的无序竞争行为也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众多小生产者倒闭，带来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在意识形态层面，面对层出不穷的私人资本侵犯消费者权益和隐私的问题，号称“人民利益代言人”的中特政府也不能坐视不管，否则将影响统治形象和权威。因此，面对私人资本在某些领域无序扩张带来的日益凸显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风险，中特政府不得不出面整治，以维持资产阶级整体统治的稳定性。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中特理论界的一个流行观点，即借列宁晚年转向新经济政策来为改革开放站台，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改革开放道路的源头活水。他们认为，二者的共同点是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且不去说二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出发点大为不同，单从对资本的态度的差异就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看似有共同之处，但二者的本质大相径

庭。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而中特不问姓资姓社，回避甚至否定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列宁说，目前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要用罢工斗争来和官僚主义以及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中特取消了工人的罢工自由，将组织起来与资本斗争的工人当做敌人来对待；列宁说，我们要用一批严厉的、示范性的审判来惩处试图逃避工人国家监督的资本主义行为，要用判处枪决的办法而不是罚款一两亿这样蠢得丢人的办法来惩处滥用新经济政策的资本家，而中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资本家真正受到与其罪行相匹配的惩罚？非但如此，资本家在依靠盗窃国有资产、官商勾结、偷税漏税、压榨工人等一系列违法行为而积累“第一桶金”过程中犯下的“原罪”要被赦免，“企业家”成为了官员的座上宾和衣食父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反倒成了为“企业家”服务的“店小二”，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可笑的是，国家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左派”无视现实，无视中特政府作为垄断资本代言人的事实，选择相信它依然挂着的“社会主义”招牌，期待依靠“党驾驭资本”来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党、代表谁的党、依靠谁的党才能真正驾驭资本？回答只能是：代表人民、依靠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毛主义政党，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政党。